北伐军进入永安情况

文史组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下举行北伐。九月，北伐军东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第十四师冯轶裴部、独立第四师张贞部攻闽。

当时统治福建的北洋军阀，是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部下周荫人（福建督办）。当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后，孙委周为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令其率部进攻粤东的潮、汕，以打乱北伐军的进军计划。周得此令，即以二十一混成旅的李生春为省防司令，留守福州，自己亲率第十二师并督令第一军张毅部、第二军刘俊部、第三军李凤翔部分三路出闽西南向粤东出击，结果大败而归。第一军张毅部由饶平、平和退往漳州；第二军刘俊部迭败于粤东的松口、松源一带，刘俊战死；周荫人在永定一败之后，即退守龙岩（后又逃往南平）；第三军李凤翔的原曹万顺、杜起云两个旅则在广东的蕉岭起义，归顺北伐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以曹万顺代理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杜起云为第二师师长（后十七军军长由何应钦兼任）。

第十七军起义后，即掉转枪头，反戈一击，曾在粤东的松口、松源一带堵击北洋军阀刘俊部，后从上杭分沿汀江两岸北上，于十月底进抵长汀东南的水口一带。与此同时，驻在赣东南一带以警戒闽方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四师谢杰部，也从瑞金进至长汀西北的古城、篁竹岭等高地，两军形成对长汀城的包围态势。城内北洋军阀李凤翔残部（原第三师师直部队），在出城堵击了向长汀城挺进的第四师之后，因发觉自己已被北伐军包围，即连夜向清流、宁化方向退却，长汀城遂为第四师所占。

长汀城被占领后，十七军只派了一个营进驻长汀城，余部均转向连城。在连城，除以第一支队罗藻部的二个连（罗原为连城民军，后为十七军收编）向清流、明溪进击外（后来该部从明溪出莘口经沙县郊外开往南平，数月后又将部队遣散，罗本人出走），其主力则向永安推进。（据说只有曹万顺的第一师部队，没有杜起云的第二师部队）大约在十一月上旬到达永安西郊的桥尾、车坡（现在的东坡）一带，其指挥部就设在车坡李家祠堂里，队伍则分布于桥尾、大溪、黑鲤鱼、南塔下等地，並递信责令城内守军投降。

城内守军是周荫人的一个团（番号不详），团长殷秉义又兼城防司令，群众称他为殷司令。知县徐赞初也是周荫人所派。当北伐军兵临城下时，他们因慑于当时革命形势和北伐军威力，经商讨后决定投降北伐军，並由知县徐赞初前往北伐军驻地进行谈判。由于当时城门紧闭，且堆有砂石，一时不易打开，也为城防的安全计，徐即在西门城楼以南的一段城墙较低处（城外是官田吴厝井，即现在的针织厂附近），坐在竹箩里缒城而下，手执白旗，前往车坡十七军的指挥部谈判。当时曹万顺本人尚在连城，和徐谈判的是一位姓余的指挥（可能是前敌指挥官）。谈判大约进行了两天时间才谈妥，第三天正欲开城

出迎北伐军进城，忽然城内气氛又一度紧张起来，殷的部队又在西门城楼一带架上机关枪、重炮，群众不知何因，还以为又要打仗，一时弄得人心惶惶。原来是殷部有一个营长、据说是周荫人的外甥，他反对投降，並拟将他的一营部队（驻在西门邓厝祠堂，现工商局原址）拉出城外，脱离殷部。这一情况为他的护兵所泄密，在紧要关头，殷秉义采取了果断措施，迅速把这一营人包围缴械，这一营长也在当晚被殷枪决。

城内扫清了阻力后，第四日即开城迎接北伐军进城，此时群众情绪很高，每家门口均插红纸旗、上书“欢迎”二字，还放鞭炮迎接，北伐军则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进城后住在第二学校（原城隍庙左侧，现老人委宿舍食堂附近）。过几日，曹万顺从连城来，永安曾组织欢迎，並在县衙门空坪上搭台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曹万顺、殷秉义、徐赞初以及地方人士刘金门、陈畴等，均有上台讲话。殷秉义的讲话大意是：“我原是周荫人的部下、是吃国家人民的粮食，也是国家的队伍，现在国家北伐大军前来，我们当然归顺……”。会后还由北伐军的剧团演了一场京戏招待与会群众。

北伐军进军永安时，军纪很好；不拉夫，不派款，态度和蔼，买卖公平。据群众反映；北伐军进城时，曾向永安两家大商店——万兴顺、永兴号借款叁千元，言明到福州后交还。结果曹部到福州后，果然如数还清。当时款是拨给福州盐公司，作为福州赖顺记行的购盐款，后由赖顺记行向盐公司陆续提盐出来（这个行即是永安万兴顺老板赖承顺开的）。又据老菜农陈日川回忆：我当时住在城北郊的西营

坂村，平时挑菜到城里卖，北伐军刚到永安时，因城门紧闭，我就将菜挑到桥尾北伐军驻地去卖，北伐军买卖很公道，不讲价钱，你讲多少，他就给多少。本县小陶一带的群众也有反映：北伐军从连城来时，曾在小陶驻一个晚上，他们从不进入百姓房间，从不干扰百姓，借物有还，损坏照赔，走时还给打扫卫生等。

北伐军在政治宣传方面，也搞得很出色，他们每人均佩带红、兰、白三色领巾，每到一地，都张贴标语，开展宣传活动（他们还事先用石印印了许多大标语，以备临时张贴）。他们在宣传时，先摇铃集合群众，然后再开展宣传。宣传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北伐的政治意义，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伐，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一是宣传北伐军的纪律；如不拉夫，不派款，买卖公平等。因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北伐军进城的更早一些时候，周荫人从龙岩退往南平，曾经过永安，他的队伍从西门入城，沿五层阶（现在的中山路南段）、分司前（现在的燕江中路北段）到住所盐仓（现在北门影剧院原址），仅住一个晚上，第二日即开往南平。周荫人进城时，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他乘坐大轿，约有一营兵，均身背莲子炮（即花机关枪）进行护卫。沿途不准群众通行，他的坐轿所过之处‘两旁房屋的群众均须背立，不准观看，要等周的大轿过后，才能恢复原状。北洋军阀惯于向人民群众作威作福，严重脱离群众，由此可见一斑。

北伐军进入永安后，原北洋军阀殷秉义团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番号不详），不久，即被调往连城驻防（一说是调往上杭驻防）；

知县徐赞初仍继续供职（后来徐在任末，曾因经济上有问题，永安群众组织代表和他清算，结果算账代表被抓起来，解往南平卢兴邦师部，为首的代表刘金门並解往尤溪，后被关死在尤溪监牢里）；北伐军除留驻永安一个营（据说是住在考棚）外，其余部队向沙县方向北开。

在进入永安的北伐军中，有一个姓尚（或姓常）的党代表，曾协助当地成立了国民党永安筹备处，筹备处主任陈畴（又名陈砚农），秘书陈咏棠，宣传部长詹春三，组织部长赖又吾，总务刘咏韶。筹备处地址设在西门饶家祠堂（即现在的中山路废品收购门市部原址）。

国民党永安筹备处成立之后，工作活跃，筹备处经常开会和开展宣传活动。街头上也出现了一些卖孙中山先生像章的小摊子，一个像章只卖几个铜板，许多人都买了像章挂起来。国民党挂孙中山遗像、青天白日旗、“总理遗嘱”等那一套开会、做纪念周的仪式，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筹备处还组织了一些人，配合学生（当时永安设有一个中学），分赴各个农村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据刘浚源回忆，他当时参加学生宣传队到大炼等地宣传，还自己带了留声机，以便于集中群众，宣传内容，主要是：北伐军的正义行动；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罪行；北伐军纪律严明和三民主义等。据林发猷回忆：他当时和陈邦永等人到东路龙依坑、上坪、九龙一带宣传，上级还发有一本叫《三民主义》的小册子作为宣传内容。有人愿意入党的先登记起来，到相当人数时即集中进行宣誓（大体上每天一次）；赖又吾回忆说：他当时是到洪田、古竹、小陶一带宣传的，入党的人都要填一张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並贴上自己的照片，他是开照相馆的，因而也结合把业务带到农村去。

一九一五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廿一条”，在那之后，各地市场上日货充斥，比比皆是。北伐时永安人民在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下，觉悟日益提高，相率起来抵制日货，永安学生联合会曾奉命组织一个日货检查团，走上街头，挨店检查，发现有日货，即予以没收。当时的日货有海带、尤鱼、漂白洋布、香烟、橡胶气球等，检查出来的日货就在街头当众烧毁，以杜绝商人再购进日货。但当时又发现有穿漂白洋布衣服的人，当场脱下来不好处理，因而日货检查团想了一个办法，刻了一个木戳子，上刻“旧置权用”四个大字，盖在衣服的口袋上，允许他穿至破烂为止，不能再买日布来做衣服穿。

一九二七年农历一月十九日，正当留驻在永安的北伐军袁党代表在永安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游行时，适逢城内赛会迎灯，按俗例，迎神花灯的路线，是要经过东门鳌山的，但鳌山早已被基督教福音堂围墙隔断，群众无法通过，此时愤怒的群众，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和袁党代表的支持鼓励下，群情激昂、连夜把围墙推倒，让群众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鳌山，使永安人民出了一口气。

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永安筹备处也取销了，另行设立永安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省党部派陈地孙为党务指导员，接管了原永安县筹备处。党员重新进行登记，没有登记的一律不予承认。

从此，永安人民就长期处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了。

砸盐仓　泄积怨

述昔

一九三三年永安县城是国民党五十二师卢兴邦的军队驻守，那时城内赌博场、花会场、妓女馆、大烟馆，以及少女卖唱的童子班，到处都有，烟、酒、嫖、赌四门俱全，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加上苛捐什税、抓丁、派款，老百姓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

这年十月某天，卢兴邦得到消息：红军快要来攻打永安城，他惊惶万状，马上派伕替他挑东西，准备连夜溜回尤溪老窝。黄昏后，他的兵大肆抓伕，並乘机抢劫。次日天亮前，卢的伪兵都跑光了，城内只剩县保卫团，寥寥几个团兵。清晨，老百姓看见大街上没有兵，知道红军快要来了。

当时食盐因运输不便，来源困难，是紧缺的生活必需物资，当局控制很严，不准外运，更不准运往苏区，百姓吃盐实行配购，数量甚微、不敷食用。而卢兴邦则自设盐仓，囤积食盐，搜括百姓，百姓非常痛恨。

这天，一群人乘卢逃跑之隙，砸开他的盐仓，扛的扛，提的提，将盐仓存盐几千斤全部拿光，大泄怨气。那天晚上红军却没有到，伪县政府事务员曾上明把城门关起来。不料半夜间，卢兴邦的第七团卢子安队伍，得知红军未到，又从上坪返回永安城内。接着红军的队伍

也到城外，在欲曙的时候，卢子安的兵与红军接触开火，城内听到枪声。早饭后，红军没有进城，向西方退去。过了几天，卢见红军没有再来，又施暴政来压榨百姓，说老百姓抢他的盐，要拿老百姓问罪。并派本城中山街人张锡育（绰号育公）为密查员，做他的爪牙，大肆抓抢盐的人。张锡育以为发财的机会到了，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指鹿为马，到处乱抓人，搞得人心惶惶，满城风雨，被抓者如有钱行贿，就免遭其难，若无钱行贿则遭捆打，抓去坐牢。不少百姓被诬陷受害，群众十分气愤。当时地方豪绅，国民党五十二师咨议郑祥符，陈畴等，就此情向卢兴邦反映。卢为暂平民愤，收买人心，以挽救残局，下令将张锡育绑出西门外枪决，作恶多端者，落得可耻下场。但这场风波并没有因枪决张育锡而平息，百姓对卢兴邦仍然是怨声载道。直到次年三月，红军解放永安城，卢兴邦垮台后，事态才告了结。

永安封建帮会“大刀会”

赖华编　李克承

相传“大刀会”起源于清朝末年，系白莲教余党，原名“大道会”后流传为大刀会，乃封建帮会组织：他们装束多是头带角巾，身穿符衣、腰束兜肚，服装上画满了符箓，打起仗来，先集中在神壇前祈祷作法术，由师傅念咒，吃下神符和朱砂酒，搞得神志昏迷，一言不发，手持红缨枪，一直猛向前冲，不懂死活。

一九三一年间，沙县夏茂、高桥一带的大刀会，兴风作浪，冲击贪官污吏。军阀卢兴邦派兵去镇压，大刀会被持枪炮的官兵打得四面逃散，有的逃往顺昌、将乐山区；有的流窜到永安、明溪乡村。自此，永安才传来大刀会。

当时，永安城被国民党五十二师罗景星旅所盘踞，势力澎涨，伪县长兼保卫团总队长林家木，常受罗旅欺压排挤。那时永安东区的上坪、青水，北区的大湖、曹远、贡川等地的农民，听说大刀会有抢炮不入的法术，为防御匪盗抢劫、抗拒官兵压榨，而纷纷组织大刀会。林家木为与罗景星抗衡，乃派其僚属四出活动，鼓励大刀会攻城，並允以保卫团作内应，密谋消灭罗旅势力。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间，东区和北区的大刀会约定时间联合攻打永安城。那天下午，青水、上坪、龙依坑、崩盂头一带的大刀会约一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十余人，到达新桥头的桥头碉堡和三堂厝内。北区新冲的大刀会联合岭后、瑶田，增田的大刀会，先攻打大湖的驻军，而后再攻县城。在大湖的梅仔岭、过路洋、马道、及大湖街上与驻军接触开火，双方都有伤亡，大湖驻军王排长败退往永安，大刀会追打到下渡，因浮桥拆开，无法渡河，而未进城与东区会师，就自行退去。

东区大刀会到达新桥头后，由一个头目龙依坑人__杨某，去找新桥头、黄竹洋二村的“甲首”，令他们派饭、送稻草、棉被，不能满足其要求。当时有两个大刀会徒，深更半夜，挨家挨户敲门，要棉被。厝内刘则明夫妇，只有一条棉被，也被拿走，冻了一夜。

大刀会到新桥头的消息，传到城里，罗旅命令将城门紧闭，城乡交通断绝，通往上坪的电话线路被截断。翌晨，有个电话兵出城巡逻，到新桥头时，被大刀会抓走，没有下落，于是局势更趋紧张。下午二点钟，新桥头村南一带山上就布满了军队，村北的林厝山，也被保卫团占领、岩仔角山边，也排列着罗部人马，全是手持红缨枪的打手，严阵以待。伪县长林家木得知围城的大刀会，仅东区的人数不多，而北路的大刀会还没到，能到多少还是问题，预料大刀会不能取胜，若被击败，则阴谋暴露，对其不利，于是改变主张，扬言亲自出城，带一名徒手随员，到新桥头，对大刀会晓以大义，劝他们撤退，则不予追究。讵料，大刀会不听劝告，坚决要攻城，林家木进退维谷，不已由那个杨头目，陪他往上坪隐逸，叫随员回去放个空气，说：县长劝撤退不成，反被劫持去了；林的家属，也假戏真做，哭哭啼啼求罗旅营救。

东区大刀会不听劝阻后，即向城里进发，当离开碉堡约百余米左右，四面山包围的驻军枪声大作，大刀会闻声丧胆，阵脚大乱，死伤狼藉。在新桥头洋里和河边，遗下尸体廿多具，其中有三具无头尸体，据说是枪声大作时，三个大刀会徒，躲进下洋肥寮里去避弹，被活捉砍头的，其头颅已被拿进城里去示众了。不到半个钟头，大刀会就往上坪方向溃逃了。

第二天，罗旅派人往东路搜索，因找不到大刀会的巢穴，就窜进小梅溪村，滥杀了两个无辜老农，带回二颗首级，悬挂衙门示众，炫耀武功，嗣经商民邓贻远认出，乃是善良农民的头，消息不胫而走，议论纷纷，罗旅怕遭物议，即令将首级掩埋。此后，罗旅一面添兵增防，一面加紧搜捕会首，大刀会便逐渐消声匿迹，活动被停止下来。而罗旅藉口清剿“刀匪”，无辜百姓也备受迫害，直到红军攻克燕城，人民始获解放。

国立福建音专在永安

倪秉豫

（一）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

福建音专创办于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一九四〇年秋，原址设在当时福建省临时省会永安县的上吉山，校园前面是一片平畴绿野，校园后面回绕着碧水燕溪，远处群山环抱，周围古木参天，阵阵松涛伴和着更深夜阑的歌声琴韵。吉山的风光尽管十分秀丽，环境十分清幽，但，乌云仍笼罩着漫漫的夜空，同时还不断飘散着日机狂轰滥炸的烟硝。当年的福建音专，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诞生。

福建音专的创办人蔡继琨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音乐，回国后热心从事教育事业，在原“福建省中小学师资短期训练班”的基础上，逐步扩办为“福建省音乐专科学校”，并延请中外名家来校执教，其中有外籍教师，如：奥地利犹太血统的音乐理论家和钢琴家马古士、保加利亚小提琴家尼可罗夫，还有早年曾侨居在维也纳的犹太大提琴家曼爵克及其夫人，钢琴家克拉拉。此后，又于一九四一年底，延聘了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和理论家缪天瑞先生为教务主任，以及其他各科教师。

福建音专当时的学制，设有三年制师范科和五年制师范科以及五年制本科三种。本科又分设“理论作曲”、“声乐“、“钢琴”、“小

提琴”、“六提琴”、“国乐（即今之民乐）等各种主科。一九四四年前后，五年制师范也一度分设了各种主科，后因许多教师被无故解聘，陆续离校，有些主科缺人讲授，此后便不了了之。一九四七年后，还招收了一班人数不多的二年制师范科。以上各科曾采用“学年”与“学分”相结合的学制。学生的生活待遇，师范科和本科中的贫苦学生以及家在沦陷区而经济来源断绝的，可享受微薄的公费待遇，仅本科中的少数同学为自费。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虽然可以在校内外兼些临时性的小工作，如刻蜡纸，抄讲义之类，但所得报酬甚薄，当时的物质生活很艰苦，许多贫苦学生由于买不起鞋子，在腊月寒霜里还拖着木屐过冬。当时学校的设备简陋，乐器奇缺，不少同学为了争取多练钢琴，还在半夜里哆哆嗦嗦地提着小莱油灯，偷偷地从宿舍里溜到琴房去练琴。后来由于半夜起来的同学多了，只好通宵排表按时去轮流练琴。

由于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省份和内地各省的水陆交通十分困难，因此华东和华南以及其他省份有志学习音乐的青年学生，不能去内地，多辗转来闽就读，除闽籍外，较多的来自浙江、广东、江西、江苏等省，还有一些是来自山东、安徽、广西、河南、四川、台湾、上海等省市。

一九四二年夏，“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改为“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福建音专”）。蔡继琨离职后，由当时福建省教育厅主任秘书郑永祥代理校长。是年冬天，正式任命诗词学家卢前（号冀野）先生为校长，当时先后在国立音专任教的教师，外籍的

除上述尼可罗夫和曼爵克夫妇继续留任外；我国的一些音乐家如：章彦。黄飞立、李嘉禄、陆华柏、程静子、薛奇逢、宋居田、朱永镇，以及现在我省的曾雨音、徐志德、王声政等先生都曾先后在国立福建音专分任各科的教学工作。他们任教的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此时的音专就当时条件来说，可谓人材济济。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卢前先生辞职离闽，前往重庆，校长由肖而化先生代理。当时福建音专的师生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影响和发动下，团结部份师生，开展了一些进步活动，如组织“时事研究会”、“鲁迅作品读书会”，并出刊壁报《铁草》《笔锋》，举办音乐会等，宣传进步思想，因此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他们认为“福建音专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于是便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进步学生事件，先后被捕的有陈宗谷、金希澍（金村田）、周鉴冰、池志立、许文辛、叶翼如、邢育青等人。有的由学校保释出狱，有的被送往“崇安集中营”和“上饶集中营”长期关押。此外，还有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发生了参加青年军的反动学生无故殴打黄飞立教授的严重事件，国民党喉舌——福建版的《中央日报》却反咬一口，说是黄飞立殴打青年军学生，黄向当时的法院投诉，竟被置之不理。为此，黄飞立教授被迫离开福建音专。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派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书记长梁龙光为校长。次年夏，又改派唐学咏先生接长音专。

一九四五年八月，唐校长从重庆来闽，到职后，解聘了王沛纶、刘天浪、宋居田、曾雨音等五位教师，同年冬天，国共签订“双十协

定”后，唐又奉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令，强迫教务主任缪天瑞先生和陆华柏先生限期离开福建。之后又先后聘请了早期的音乐教育家刘质平、著名作曲家陆仲任、陈田鹤、钢琴兼合唱指挥魏非比。李永刚、声乐家李英。陈玄、冯坤贤、周遇春、小提琴家司徒兴城、陈宗晖等来校执教。同时还聘请文学家陈遵统(号易园)先生来校讲授《中国文学史》和《诗歌词曲》。以后又陆续聘请了美籍教师莲娜、德利亚、福路等来校担任声乐和钢琴的教学工作。

上坪牡丹今犹香

相传唐朝武则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饮酒作诗，要百花同时开放以助酒兴，就醉笔草书下诏说：“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开，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武后权势，全部连夜开放，独有牡丹傲然不开。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从长安贬往洛阳充军。牡丹到了洛阳，马上昂首怒放，彩辉四射。

洛阳花事为何以牡丹为盛，这与洛阳的地理气候分不开，正如欧阳修所说：“洛阳地脉花最宜，尤以牡丹天下奇”。然而，在我省永安上坪，几十年来，也有牡丹敢同洛阳争奇。

一九〇一年，永安上坪有一位姓陈的有钱人家，托人从洛阳捎来两棵牡丹花苗，种在家院的天井里，由于护养不周，只活了一棵，第三年初夏开花，花单生，呈水红色，轰动了永安县城，有人坐轿上山赏花，有人想方设法从这里采枝条到城里插栽，但没 （下接23页）

三 次 大 逮 捕

——回忆国民党对国立福建音专师生迫害经过

陈炳煌

我是一九四二年八月考上国立福建音专本科三组理论作曲科的。音专校址设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城外五公里处的上吉山，这里风景秀丽如画，空气清新沁人心脾，环境幽静安谧，左侧群山迤逦，北陵殿横空嵌托，碧蓝的燕溪环绕，终日潺湲不息，这么美好宜人的胜地，该是个多么好的读书地方！但是，那时候，在国民党法西斯的统治下，政治空气污秽不堪，一个小小的音专，只有弹丸大小的地方，一百多位师生的学园里，也逃脱不了反动派魔掌的染指，真是上吉山景色虽好，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要说这三次大逮捕，前因后果，充分暴露出国民党政权对青年学生、进步教师残酷迫害行径和卑鄙无耻的嘴脸。

人们常说，要干反革命勾当，必先制造反革命舆论，事实上，国民党就是这样干的，一九四二年十月间，音专二年级学生王良华（又名王雪辛）被省保安处传讯到梅列去，离开前夕，同学们在大礼堂举行了一个小集会，会上许文新（即许文辛）起立发言，他慷慨激昂，痛斥国民党迫害青年学生的罪行，与会者都很激动，不久，王良华被释放回校了。于是谣言随之而来，说王是保安处派回音专监视缪天瑞

的、（当时音专教务主任、老一辈音乐理论家）。过了不久，另一位叫邢育青的同学又被捕了。据今年五月十八日广东同学叶翼如来厦门时说的；邢被捕后，为了求得尽快释放回校学习，信口雌黄，胡供什么音专有党组织，书记是陈淙谷，支委有金希树、周鉴冰（现名周修训）等人。特别是邢写的日记本被搜查去了，内中流露对现实不满，问题的严重性是日记中牵涉了许多同学。不久，邢育青被释放回校了，谣言越发离奇了，甚嚣尘上，说什么福建音专校内是中共在永安的一个训练班组织，指导员是郑书祥（音专历史教授原在厦门，是共产党员），训练班负责领导省立永安中学、大湖永安师范两校党组织工作等。事实上，当时音专虽有几位党员学生，大都是从浙江、江苏、江西、广东等省来的。他们有的来自新四军、有的是进步的文艺团体、学校並无党的组织。据许文新回忆，他本人从“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到永安考上音专，组织关系还在永春蓬壶哩！不过，当时地下党员做了不少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的工作，如成立文艺小组，组织读书会，出版《铁草》等壁报，由许文新、何苇合编。还经常公开介绍青年看书，如介绍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理》等。所以说，邢育青的胡乱招供，只能是给敌人提供大肆逮捕、迫害进步学生的借口，而邢本人终于露出马脚，无颜继续留校，达不到复学的愿望，只好悻悻离校而去。

去年八月，我到杭州大学找到陈淙谷，畅谈竟夕，自然联系到一九四三年初冬第一次大逮捕音专学生事件。陈淙谷那时动了感情地痛斥音专总务主任李简斋（南京人，国立音专第一任校长卢前带来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